

雨花忠魂

雨花英烈系列纪实文学

落英祭

恽代英烈士传



徐良文 于扬子 著

恽代英(1895-1931)

祖籍江苏武进，出生于湖北武昌。1915年考入武昌中华大学。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当选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兼宣传部长。1924年国共合作时期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宣传部秘书。1926年在国民党二大上当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同年任黄埔军校政治主任教官兼中共党团干事。1927年1月任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政治总教官，5月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中央委员。1928年6月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1929年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长。1930年任中共沪中、沪东区委书记，同年5月在上海被捕，1931年2月解来南京，4月牺牲。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雨花英烈系列纪实文学

落英祭

恽代英烈士传



徐良文 于扬子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落英祭：恽代英烈士传 / 徐良文，于扬子著. —
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6
（雨花忠魂：雨花英烈系列纪实文学）
ISBN 978-7-5399-9136-8

I. ①落… II. ①徐… ②于… III. ①纪实文学—中
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66156 号

书 名	落英祭：恽代英烈士传
著 者	徐良文 于扬子
责任编辑	黄孝阳 聂 斌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6.25
字 数	162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9136-8
定 价	35.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雨花忠魂·雨花英烈系列纪实文学”

丛书编委会名单

王燕文 李朝润 张亚青 万建清

范小青 韩松林 汪 政 阎海燕

不朽的精神 永远的丰碑

罗志军

南京雨花台，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共产党人最集中的殉难地。在这里，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不朽的精神丰碑。

信仰如山，信念如磐。在雨花台英勇就义的革命烈士有近十万人之多，其中留下姓名的就有1519位。他们当中不少人出身富裕家庭，受过良好教育，牺牲时正值青春年华。为了心中的理想和追求，他们毅然舍弃优厚的生活条件，走上充满荆棘的革命道路，虽身陷铁窗炼狱却临危不惧、顽强不屈，不惜流尽最后一滴血，献出年轻而宝贵的生命。他们的事迹展示了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信念、高尚道德情操、为民牺牲的大无畏精神。今天，人们每每参观雨花台烈士陵园，悼念雨花台烈士群体，都感受到巨大的心灵震撼和精神洗礼。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苏时指出，“要注意用好用活丰富的党史资源，使之成为激励人民不断开拓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雨花英烈的革命人生辉煌壮丽，雨花英烈的崇高精神高山仰止。江苏省委宣传部、省作家协会组织创作的这

套“雨花忠魂·雨花英烈系列纪实文学”，以文学的形式集中讲述何宝珍、邓中夏、恽代英、冷少农、罗登贤、朱克靖等多位雨花英烈的革命故事，为弘扬雨花英烈精神提供了生动教材，为广大党员干部永葆本色提供了精神之“钙”。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征程上，我们要大力继承和弘扬雨花英烈精神，铭记他们催人泪下的英勇事迹、永载史册的不朽功勋，自觉做到信仰、忠诚、为民、担当，开拓进取，扎实工作，加快建设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的新江苏，以“两个率先”的崭新业绩告慰雨花英烈的在天之灵。

雨花英烈精神不朽，理想信念之树长青！

目 录

引子	001
第一章 分歧	003
第二章 被捕	039
第三章 营救	057
第四章 探监	082
第五章 出卖	123
第六章 斗争	145
第七章 就义	161
尾声	184
参考文献	187

引子

恽代英慷慨赴死那年，只有三十六岁，这是一个充满无限想象的年龄，假设他不死，依他的学识、才华、资历和经验，在那山河破碎、乱世竞雄、百舸争流的动荡年代，谁能想象他可以演绎出多少风云激荡的历史大剧来？

然而，历史没有假设，他义无反顾地走向了刑场！

他是可以不死的，因为他有不死的本钱。

他是《中国青年》的创办者，被无数爱国青年尊为导师，在青年学子中有着广泛的影响力；他继周

恩来之后，做过黄埔军校的政治总教官，深受黄埔军校学生的爱戴；他还是国民党二大的代表，在国民党二大上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当然，更因为他参与了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南昌起义，他是共产党前敌委员会的四名委员之一；广州起义，他和张太雷、叶挺是三人领导核心成员。1927年中共五大上，他被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先后担任过中央组织部秘书长和中央宣传部秘书长，共产党中央组织部可是掌握着共产党核心机密的机关！

正是他拥有的这些本钱，蒋介石愿意和他做笔交易，他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或者是死。

选择生，意味着将拥有当政者的高官厚禄，金钱、美女和享不尽的荣华富贵；选择死，那就要奔赴刑场，抛妻别子，斩立决！

恽代英毫不犹豫地做出了选择：死！

他的人生信条是：有些东西是不能拿来做交易的，譬如主义和信仰！我宁愿为忠诚而被绞死，也不愿为偷生而背叛！在背叛与忠诚面前，他选择了忠于主义，忠于信仰！

于是他鲜活的生命在他三十六岁那年戛然而止，终止在国民党蒋介石的屠刀下，而他精神的生命却依然蓬勃，一直延续到今天，而且还将继续延续！

大地上回荡着一声长吟：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恽代英属于后者！

第一章 分歧

1

恽代英被捕是在1930年5月6日，地点是上海杨树浦。

那天，他身着短衣，一副工人打扮，带着一包传单和活动经费到杨树浦韬明路（今通北路）附近的老怡和纱厂（今上海第五毛纺织厂）门前等人接头。

早上妻子沈葆英帮他收拾东西，临行前，妻子对他说：二哥，今天你就别去工厂了，我总觉得有些不对劲。

代英回答：不去不行啊！怡和纱厂的支部刚遭到破坏，工人信心

受到打击，我必须去当面交代一下！

妻子便不再阻拦，叮嘱他一定要格外注意安全。

此时，恽代英的职务是共产党沪东区行委书记。在此之前，周恩来兼任中央组织部长期间，他担任中央组织部秘书，协助周恩来工作；后来又担任中央宣传部秘书长。因为几次在党的会议上当面批评李立三左倾盲动的一些错误主张，让李立三很是不快。此时，周恩来在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刚过而立之年的李立三独揽中央大权，面对恽代英的批评，李立三甚为恼火，给恽代英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调和主义”两顶帽子，并撤销其中央宣传部秘书长的职务，将他下放到基层一线，先是任沪中区行委书记，不久又调任工人密集的沪东区，任沪东区行委书记。基层一线是火线，同敌人当面对面锣地抗争，又是在白色恐怖包围之中，其危险性可想而知，恽代英却坦然接受，“衣披旧短衫裤，足御破皮鞋而不着袜，往与贫民窟内”。

就是说，一个共产党的中央委员、区行委书记，穿着没有袜子的破皮鞋整天往贫民窟里钻，和浑身汗臭的工人们交友谈心，亲若兄弟。

恽代英和李立三的分歧发生在1930年三四月间。争议的焦点是：共产党当前的任务是举行城市中心暴动，还是像朱毛那样开展农村根据地的游击战争。

广州起义失败时，撤退的前一天，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队正在英美帝国军舰的炮火掩护下猛攻观音山，起义总指挥张太雷血洒疆场，红军战士们纷纷倒在血泊中。红军总指挥部内，恽代英对着黄埔学生陈同生说：“古语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假如我们下决心造三十年反，决不会一事无成的。年轻人，有决心干三十年革命，你不过五十岁。接着再搞三十年建设，你不过八十岁……”恽代英说这番话时，睁着血色的眼睛，他从失败的血泊中看到的是光明。但是，此刻

的他也在战友们流淌的鲜血中明白一个事实，敌强我弱之中，不能拿一个鸡蛋的家当去碰石头，要有同敌人作长期斗争的打算，“造反三十年”！

在上海的李立三却不认同：造反三十年？等胜利那天我们头发都白了！

这就是恽代英和李立三认识上的分歧。恽代英也曾一度热血沸腾，和李立三手把手、肩并肩参加了南昌起义，并且把企图阻止起义的张国焘骂了个狗血喷头；南昌起义失败后，李立三到上海，他撤退到香港，又和张太雷、叶挺等一起举行了广州起义。但在两次暴动失败后，恽代英开始冷静思考，共产党拿起枪杆子，以武装的革命对付武装的反革命，是开天辟地的壮举，问题在于拿起枪杆后何去何从？是进攻大城市，还是占领农村，建立根据地？他开始意识到国共之间的斗争是一场持久战。而李立三却仍然围着共产国际的指挥棒转，坚持城市中心暴动的速决战，恨不得革命在一夜间成功，打天下，坐江山，他等不及了。

所以，李立三在实际掌握了共产党中央的领导权时，采取了比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更为冒险的举措。他制定了一个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大城市的冒险计划。提出“暴动、暴动、再暴动”，高喊着“进攻、进攻、勇敢地向中心城市进攻”，命令在上海、南京、武汉、广州、大连、青岛、天津、哈尔滨等城市举行罢工，命令弱小的红军离开赖以生存的根据地去攻打敌堡林立的大城市，他描绘了一幅成功的蓝图：“打下长沙，夺取南昌，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他的全国总暴动计划是：

以红四军、红十二军、红三军编为红一军团，由朱德、毛泽东指挥，攻打南昌、九江，切断长江，掩护武汉的胜利；

以红五军、红八军、红十六军编为红三军团，由彭德怀、黄公略、滕代远指挥，占领大冶，切断武（汉）长（沙）铁路，进迫武汉；

以湘鄂西地区红军编成红二军团，由贺龙、周逸群指挥，帮助地方暴动，进迫武汉；

鄂豫皖地区红一军由许继慎、徐向前指挥，切断京汉铁路，进迫武汉；

广西的红七军、红八军由邓小平、张云逸指挥攻击柳州、桂林，进逼广州，然后北上合攻长沙；

各路大军的最后指向是：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如果不明了实际情况，相信看完这惊心动魄的庞大暴动计划，所有的人都会心潮激荡、热血澎湃！

可李立三似乎忘记了，他纸上的许多军团只不过是一些被蒋介石称为“土匪”的弱小的地方游击队。那时节，这些“土匪”在蒋介石眼中根本不值一提，自顾自去和他的强劲对手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张发奎、唐生智们一争高下、一决雌雄，这些地方诸侯才是他眼下的心腹大患。

对李立三雄心勃勃的计划，就连远在莫斯科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团长瞿秋白知道后也不住地摇头叹道：“李立三简直是发疯了！”

2

不过，李立三的“发疯”也有他的理由。

1928年6月4日，张作霖在皇姑屯被日本关东军炸死，张学良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一星期后，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服从南京国民政府。同年7月1日，张学良向国民政府发出《绝不妨碍统一电》，蒋介石从形式上获得全国统一，问鼎他权力的巅峰。

可惜好景不长，仅半年时间硝烟又起，1929年，“军阀重开战”。先是有3月的蒋桂战争，后有9月的张发奎联桂攻粤；10月，爆发蒋冯大战；12月，石友三、唐生智又同蒋介石翻脸；转年春上，阎锡山、冯玉祥再一次举起反蒋大旗，双方集结一百多万军队，磨刀霍

霍，剑拔弩张，准备决战中原。

军阀争霸闹内讧，使在白色恐怖包围中的共产党绝处逢生、得以喘息，在夹缝中求生存的红军和苏维埃运动发展迅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生动局面。到1930年3月，红军已有第一军至第十三军共十三个军，六万二千七百三十人，二万八千九百八十二支枪，建立了湘赣、赣南、闽西、湘鄂赣、闽浙赣、洪湖及湘鄂西、鄂豫皖、左右江等大小十五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共产党所领导的游击战争扩展到十二个省、几百个县。后来的中国工农红军的三大主力——一方面军、二方面军和四方面军在这一时期初具雏形。

这时，隐蔽在上海的中央中央，由“胡公”掌实权。

“胡公”即周恩来。周恩来是众所周知的共产党领袖，出任过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和北伐军的总政治部主任，国民党内很多人都认识他，为防止危险，周恩来就不停地变换姓名和住址，外出时间也严格控制，一般外出都是在清晨5点至7点，晚上则在7点以后，并且少走大马路，多穿小弄堂，从不搭乘电车，也不去公共场合。因周恩来外出通常都装扮成商人，留起了一把大胡子，所以，内部人称“胡公”，对外则称“伍豪”。

周恩来的观点是“目前党的总的政治路线”就是“夺取群众”，而不是在广大范围内直接从事武装发动。恽代英是周恩来观点的坚定支持者。

没想到的是，就在这一年，共产国际接连给中国共产党发来四封指示信，四封信的核心内容就是要中国共产党着重反右。刚以“左倾盲动”的名义下了瞿秋白的权，弄到莫斯科坐冷板凳，怎么又要反右？纯属不明情况、不顾事实的瞎指挥。

周恩来没能抵挡住共产国际来信的影响，在1930年2月的政治局会议上他发言说：组织政治罢工，组织地方暴动，组织兵变，集中红军攻坚，“这四大口号是我们目前的中心策略”。

李立三的头脑却开始膨胀，在这次的政治局会议上，他提出：“在某几个省的形势之下，组织一省或几省暴动，在今天就应有坚决决定，首先就是湖北问题。”

两人都谈暴动，但在意思表达和实际行动上却有区别。

周恩来在实际行动上是冷静的，不赞成不顾一切地蛮干。在参加江苏省党代表大会时，他强调：“所谓新的高潮与直接革命形势是不同的，现在已经有了新的高潮，但还不是直接革命形势。”

李立三却说得干脆：“革命高潮与直接革命形势是一个东西。”

3月初，中共中央派周恩来来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工作。周恩来一走，李立三一下子松开了手脚，很快就把全国武装暴动从纸上提到行动日程上来。

曾担任过陈独秀秘书，后来调中共中央组织部工作的黄玠然回忆：

1930年春，李立三同志曾主张在南京举行暴动，那时周恩来同志尚未出国，曾与立三进行争论，制止了南京暴动，周恩来同志出国后，立三的盲动主义的主张，越来越强烈，代英同志当时是宣传部的秘书，我听说代英同志首先反对立三同志的盲动主义。他从当时客观的实际情况出发，坚决反对立三同志的盲动主义观点，两人发生了严重分歧。对此，我极为关切。有次我去训练班，遇到了代英同志去讲课，我迫切地询问他与立三同志争论问题的内容。他严肃地批评立三同志对于形势的错误估计，批评他不作阶级力量的对比，批评他违反革命发展不平衡的原则，主观主义地要组织全国暴动，这是不可容许的盲动主义，这是儿戏，暴动，是极其严重的政治错误。代英说后，不胜气愤！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代英同志的发怒。当时我的水平不高，还劝他同志间的争论可以通过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来解决。代英同志说，这已不是批评的问题，而是一场严重斗争的问题了。因为要上课，我们就没有再往下谈，我看到代英同志如此气愤，心中极为难受……

由此可见，恽代英和李立三的矛盾在中央机关已是公开化了。

3

1930年的春天。

眼见国内蒋冯阎军阀大战在即，年轻气盛的李立三按捺不住心中燃烧的激情，认为全国范围内直接革命的形势已经到来，“群众只要大干，不要小干”。现在已经具备了全国“大干”（武装起义）的条件。幻想着“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

李立三坐在上海云南路一座租来的房子里，坐镇指挥，发号施令，不断地颁发军队番号，签署委任状。某一地区有几名游击队员，他便委任一名司令；某一地区有一二百人的队伍，他就颁发一个师甚至一个军的番号；某一个同志新到国民党军队中任下级军官，他即命令他发动兵变。这个从没穿过军装打过仗的白面书生忘乎所以，纸上谈兵，使虚假的军事编制迅猛增长。

他左一个命令，右一个指示，今天指挥进攻这里，明天指挥占领那儿，自己忙得团团转，也把共产党各级领导和红军指挥员弄得晕头转向，不知所措。

为实现中心城市武装起义的计划，李立三将刚刚恢复发展起来的白区党组织、青年团、工会、少共等领导机关合并为准备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在他眼中形势一片大好，前途一片光明，他头脑里虚构的革命潮流似乎越来越高涨，他信心满满，幻想着能像苏联那样，克里姆林宫一声炮响，就能夺得全国政权。

李立三十足的狂热引起恽代英的深深忧虑，他觉得李立三这个总暴动方针无异于画饼充饥，并不靠谱。面对手握重兵的国民党反动势力，让弱小的革命武装和毫无军事训练的工人、学生和城市搞中心暴动无疑是以卵击石。那么在此之外是否还有第二条道路？他在痛苦地思考！

恰在此时，中共福建省委在厦门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恽代英以

中央代表的身份出席了这次会议。这次会议成为点燃恽代英和李立三之间矛盾的导火索。虽然，大会在分析总形势时，恽代英也提出党的主要路线是要造成全省总暴动，但在制定省委具体任务时，却审时度势、留有余地。如：强调白区工作应利用合法形式开展斗争；应深入与扩大土地革命；在加强厦门、福州、漳州城市工作的同时，强调健全闽西特委，建立闽北特委；特委工作重点是发动群众，发展游击战争，在游击战争中建立和扩大红军，巩固红军中党的领导；闽西红军应向敌人力量薄弱的闽南发展，而不是向敌人力量较强的广州方向发展等。

明眼人一看便知，恽代英的这些具体做法和李立三发动城市中心暴动的计划是背道而驰的。

福建省委还在报告中提出：“为加强省委的指导力量，恳请中央把恽代英同志留在福建工作，万望中央允许，电复为盼。”

可以想见李立三在见到福建省委会议报告时的情景，他勃然大怒。他在3月11日和4月14日两次给福建省委、军委写信，指责恽代英关于白区地下工作应采取灵活的合法斗争策略是“错误的”，在“关于兵运与红军的策略上更犯了错误”，强令福建省委“防止一切保守观念”，立即行动起来，实行全省总暴动，命令新建立起来的闽西六团红军“立即集中起来，建立红军第十二军”，向广州方向发展。

一个要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一个要催促实施全省总暴动。一个要向敌人力量薄弱的闽南发展；一个要命令要进军广州。

意见相左，剑拔弩张。

李立三决不能让恽代英留在福建，让他立即返回上海！

而恽代英则在厦门开完会后，去了朱毛创建的闽西苏区。他沿着秘密交通线，穿过崇山峻岭，踏上了闽西苏区的土地。正是这次闽西之行，使恽代英心中豁然敞亮，他更加坚定地认为，福建省委的报告没有错，当务之急不是什么进军广州，举行中心城市暴动，而是去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开辟革命根据地，发动群众，建立苏维埃。